

孙中山人口思想研究

——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崔林 姚敏华

我国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作为一个政治家，对许多社会问题都密切关注。由于他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由于他幼经贫困，深知民间疾苦，痛感民不聊生，因此，在他的许多著述中都涉及到人口问题，人口思想成为他整个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孙中山人口思想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对人口问题有较深认识和较系统论述的思想家之一。据考证，孙中山遗著中有涉及人口的论述有“一万三四千字”^①。归纳起来，他的人口思想可列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 人口实力论。孙中山一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他从“国以民为本”的观点出发，认为人口是国家的实力。当时的中国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已经逐步沦落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瓜分的一块肥肉。孙中山先生指出，中国“所受的祸害详细的说：一是受政治力的压迫，二是受经济力的压迫，三是受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这三件外来的大祸，已经临头，我们民族处于现在的地位，是很危险的。”^②孙中山把人口众多看作是国家强盛的一个标志。他在广州设立护法政府时，一次与英国领事谈及实力，说：“日本的人口和富源，不及中国远甚，如果依你今天所说的办法，我们中国参加你们一方面，中国不到十年，便可以变成日本，照中国人口多与领土大，中国至少可以变成十个日本。”^③在讲演“民族主义”中，他比较了中国和欧美国家人口增长的情况，强调中国“近一百年内，已经受人口问题的压迫，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外国人口总是日日增多。”^④可知从人口数量方面来推测，中华民族的将来是万分危险的。孙中山又以明显的语调申述此意，“到一百年后，如果我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少，他们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吞并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所消化，还要灭种。”^⑤出于对民族危亡的考虑，孙中山极力主张人口增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御侮图强、振兴中华。

近代学者吴希庸曾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人口思想归纳为：1. 民族是一个绝大的力量，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2. 中国人口不增加，而列强人口增加很速，将来中国有亡民灭种之患；3. 为民族计，中国人口必须与列国人口同等增加。^⑥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孙中山的人口实力论思想。

(二) 人口国情论。孙中山将中国人口众多视为基本国情，认为办事情都应该从当时的四万万人口出发，充分考虑到中国是“以四万万人口为主”的国家这样一个实际。

孙中山革命实践活动的一个特点是注重研究国情，掌握国情。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日发布的《告全国同胞书》中，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见解——“期建吾中国于坚定永久基础之上，务求适合于国力之发展”^⑦。孙中山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也常强调人口这一国情，他说：“中国之为国，拥有广大之地，无量之富源，众多之人力。”^⑧在其精心编制的《实业计划》中，他首先考虑的国情是幅员广大，因此，他提出了把发展交通事业放在首位的主张，以充分利用国土和人力资源。孙中山在对中国人人口分析后明确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农立国”，中国人口中，农民占了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是农民。^⑨因而孙中山十分强调发展农业生产。

孙中山还注意“以全国人口通计”同别国作比较。如他指出：“按工业发达之国，其年中出息，以全国人口通计，每年每人可得七百元，”而中国“按全国人口男女老少通计，每年每人可得七、八元耳”。^⑩这是我国较早关于人均国民收入的论述。在孙中山的晚年，他一方面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民族独厚”，另一方面又深感人口太多又是个包袱，要解决吃饭穿衣问题，非要“详细研究不可”。在对民生主义的系统论述中，他更多地强调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解决“民生”问题，即四万万人口的衣、食、住、行等问题。

(三) 人口素质论。孙中山先生认为要恢复昔日的民族地位，振兴中国，首要的问题是必须提高全民族的人口素质。这个素质首先是指心理和品质而言，用他的话说：“我们今天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⑪孙中山一方面批判了中国民族的某些劣根性，认为中国受列强欺侮并不在船不坚，炮不利”，而在于人口素质差。因此，他在“建国方略”中专门讨论了心理建设问题，指出心理建设是革命建设所必要的。除此之外，孙中山在许多具体的人口素质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饮食是较科学的，“倘能再从科学卫生上再做工夫，以求其知，而改良进步，则中国人种之强，必驾乎今日也。”^⑫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中，如何增进中华民族的素质是一个重要内容。他不断指出，只有四万万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去学欧美之所长，才能和欧美并驾齐驱。至于如何实现民族素质的提高，孙中山研究得更多，指出首先必须要实现三民主义，其次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使中国人民成为有文化、有教养，体魄健康，掌握科学的人民，然后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四) 人口分布论。针对我国东南人口稠密，西北人口稀疏，分布很不平衡的状态，孙中山提出“殖边移民”，调节全国各地的人口密度，并将其作为开拓人民生计的一个重要途径。认为移民可以充分地利用人力地力，可以使应裁之兵和众多的人口得到妥善的安置。在与上海《民主报》记者谈话时，孙中山指出要通过计划交通，特别是兴建铁路来鼓励投资和开发边疆，从而带动人口向边远地区移居。“货之弃与地，必荒僻为多，荒僻则足以移民，为世界公认，生齿者繁，至吾国而极矣。……吾有天然固有之殖民地，置而不经营。置而不经营，则以贫患之国，又自重过庶之困，乃所谓大愚不灵者也。”^⑬他认为人口分布不均匀会加剧过密和过疏状况，从而使国穷民困。

在其《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强调：“以国民需要之原则衡之，则移民实为今日急需中之大乎者。”^⑭通过移民，既可以使稠密地区的无业游民有工可做，又可以使地广人稀地区

的资源得到开发，做到两全其美。“假定十年之内，移民之数，为一千万，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其普遍于商业世界之利，当极浩大。”^⑤为了做好移民实业，孙中山还主张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予移民以各种优待，而且就此制订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

二、孙中山人口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在青年时代，孙中山就对中国人口问题有了一些看法和见解。他从小就看到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口过多所致。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中就指出：“盖今日之中国，已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上则仕途壅塞，下者游手而嬉……由斯而往，其势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胡以立国？”^⑥孙中山忧虑“人满为患”，指出了人口增殖太快造成的严重后果，致使农者无田，工者无业，官者无事。其时，孙中山还不足三十岁，尚属一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

促成他这种人口思想的直接原因是清代中国人口急剧增加的现实。从1741年（乾隆六年）的14,341万增加到1840年的41,282万，百年之中，中国人口增加了近两倍，以致人多地少，米价腾贵，民食日艰，社会动荡不已。从思想上来说，孙中山主要受清代以来的“患多派”的影响，与洪亮吉、汪士铎、薛福成等对人口多寡的看法如出一辙。当时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薛福成对孙中山的影响很大。薛福成与李鸿章关系甚为密切，当时，洋务派与李鸿章等洋务官僚接近的人几乎都认为中国人口过剩，认为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结果“昔供一人之衣食，而今供二十人，”“昔居一人之庐舍，而今居二十人”，^⑦人们的生活日益困苦。孙中山早年提出的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是要学习西方技术，通过洋务运动，发展生产，扩大就业，以解决“工不应人”的状况；增加粮食生产，以供应更多的人口。这颇接近于薛福成和陈炽早先提出的主要观点，他们都主张发展机器生产，扩大就业，使人民有“衣食之源”，而这与洪亮吉束手无策的悲观论调截然有别，更与汪士铎主张用“刀兵消息之”的残酷办法鲜明对立。

可以认为，孙中山早年对人口问题的看法，只能被认为是一个有识青年对中国当时面临的人口问题的关心，还不能称作系统的人口思想。孙中山对人口的系统论述是伴随着三民主义而形成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孙中山的人口思想是三民主义的人口思想。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遭冷遇，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孙中山毅然投身革命，三民主义的思想开始逐步形成。近代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八国联军的侵略，强烈地刺激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帝国主义一是以政府和军事为主体的“侵略的膨胀”，一是以人口和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的膨胀”，后者称之为“民族膨胀”（包括“生产膨胀，人口膨胀和资本膨胀”），孙中山也深受此影响。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上，从中华民族兴旺和对世界各民族人口增长的比较中，他认为中国不仅受到列强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而且受天然力——人口的压迫。他从“国以民为本”的观点出发，主张增殖人口，认为人口多少会直接导致国家民族的兴衰。他坚决批判了当时西方盛行的所谓“黄祸论”，并对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予以批驳，指出，由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流行，“于是乎国家殖民政策缘此发生，弱肉强食，劣败优胜，死于刀兵者，固属甚多，其受强族之蹂躏，

沦落而至于种族灭绝者，又比比皆是也”。^⑩孙中山早在伦敦蒙难时，日赴大英博物馆藏书馆，认真研读了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方面的著作，完全有可能在此读到了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可惜没有史载。

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同时，他一再警告人们，列强的人口翻了好几番，而中国的人口总是不加多。需要说明，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连年战争，中国人口增长趋于停滞，而与此同时，欧美各国正处在人口的转变增长阶段，但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翻几番”，这种差断是由于缺乏精确的外国人口统计资料。此外，孙中山此时“患少”的人口思想是与他当时的民族主义主张是一致的。孙中山摒弃了早期改良主义的洋务思想，开始极力鼓动民族革命，这种民族革命不仅指向满族政府，也指向了列强各国，不仅是为了民族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强盛，而且也为民族自然力（人口）的强大。因此，从忧虑“人满为患”转向“增殖人口”这种思想上的大幅度转变，就不难理解了。除了民族意识之外，孙中山也多多少少地受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缚，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接受了“广土众民”的人口思想。这一传统的意识在中国之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持此见，连孙中山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未免受其影响。

晚年时孙中山人口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人口问题实事求是的、更为全面的认识。在讲述“民生主义”时，孙中山从“民以食为天”，论述人口必须进行各种消费。以“饮食为证”，饮食者，最为寻常，人所皆需，“无待于教者也”，“婴儿一出母胎皆能之”，又是人生至最为重要的。“吃饭是项重要的民生问题，……是关系国家之生死存亡的”，^⑪可食物来自土地，人口过多，就与有限的土地发生矛盾，“全国人民现在还不够饭吃，每年饿死的数，大概过千万，这还是平时估算的数，如果遇到水旱天灾的时候，饿死的人数就不止千万了。”^⑫孙中山分析了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并涉及到了人口的相对过剩问题。可见，他的人口思想是日趋全面的。他一方面认为人口是一大实力，需要增长，中国人多有利于民族昌盛；另一方面也充分认识到了人口又是消费群体，增长过多会给“衣、食、住、行”带来巨大困难。同时，他对解决人口问题的态度也是非常现实的，指出对于庞大的中国人口，“我们现在要解决民生问题，不是要解决安适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奢侈问题，只要解决需要问题，这个需要，就是要全国四万万人都可以得到衣食的需要，要四万万人都都是丰衣足食。”^⑬

对于人口素质、人口迁移与分布、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等，孙中山也都是逐步涉及，随时间推移而展开论述的，并在晚年时期日臻成熟的。

三、对孙中山人口思想的评价

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人口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可看作是孙中山思想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以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人口思想的基础。

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其主要的政治主张《三民主义》一文中，孙中山不惜笔墨专门而又详细地论述了人口问题。其主要缘故为，人口是民族的实体，所以孙中山一再强调人口不能减少；民生是一定人口的民生问题，因此人口多少与“食衣住行”密切相关；民主是全体人民的民主，提高全体人口的素质是民主的前提。如孙中山那样对人口问题有较系统论述的中

国近代政治家，不可多得。

作为一个思想家，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在中国近代人口思想中位置显著，他被认为是当时自成一派的人口思想家，民族主义（也称众民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中国近代社会学家陈长衡先生专门著有《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一书。其他专门论述和评价孙中山人口思想的著作和文章有《民生主义与人口问题》（王警涛），《三民主义的人口论》（李海士），《马尔萨斯与民族主义》（蔡步青），等等。散见在其他著作和文章中的关于孙中山人口思想的论述为数甚多，研究孙中山乃至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者都不能不对其人口思想予以较大的关注。可见孙中山的人口思想的影响是广泛的。

对于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如何评价？吴希庸先生曾将旧中国人口学说分为众民主义、乐观主义和节制主义三个派别，并视孙中山为民族主义（众民主义）派的首领。这也代表了近代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因为他们都是以民族主义讲演词中的人口思想为根据。唯有陈长衡先生在考察了孙中山有关人口思想的全部言论后，认为“中山先生并未无条件的提倡增加人口，而且为忧虑人口过庶的最先知和最先觉。”这样就将“中山先生的人口思想与节制主义联成一气。”^②

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孙中山人口思想的评价也有不同的见解。一些人倾向于孙中山属于“众民主义”思想，主张大力增殖人口，也有人认为孙中山的人口思想主要是“人满为患”，而同时又忧虑中国人口增长锐减的说法“不能代表孙中山人口思想的主流。”^③

我们认为，对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应该全面地发展地去考察，而不能片面地孤立地去解释。不可否认，孙中山对人口问题的看法有前后不一之处，但这不能说是自相矛盾。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他从不同角度来论述问题，也说明孙中山的人口思想是在不断充实和发展的。

“人满为患”之说，是他青年时代从关心国家社会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角度提出来的。后来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又提出了“众民主义”的人口思想，但从“民生主义”出发，他又充分认识到了人口过于庞大带来的许多生计问题。究竟人口的多与寡孰优孰劣，孙中山并没有一个抽象的、简单的定论。很难确认“人满为患”与“众民主义”究竟那一种是孙中山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使只考察作为人口思想的“三民主义”论，也不能仅以“民族主义”为准。

孙中山人口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对中国人口问题采取的乐观而又现实的态度。这既区别于马尔萨斯及洪亮吉、汪士铎等悲观论者，也与盲目乐观派大相径庭。虽然他在民族主义中主张增加人口，但并没有要求过快，只求与列强速度等同，并充分考虑到了即使这样，中国人口之众也将在各方面遇到巨大的困难。这与同时代的梁启超过分乐观地认为中国人口从来没有过，将来也绝不会发生“人满为患”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虽然强调了人口的作用，但不能被视为是“人口决定论”者，他并没有将国家民族的兴衰仅仅归结为人口的多寡，而是认为中国受到列强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比“天然力（即人口）来说还要大，”“还要快而且烈”。^④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命运由政治经济状况决定，这是孙中山与以前思想家人口论点的很大不同。

毋庸置疑，孙中山的人口思想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首先是历史的局限性。当时的人口科学研究尚未系统展开，人口统计资料更是匮乏，决定了孙中山在论述某些人口问题上产生了偏差；其次，孙中山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人口学家，政治家考虑人口问题需要与

其政治思想相一致，况且他没有精力对人口问题作更为深入的研究。正如吴希庸所言：“中山先生是一位政治家，又生在贫弱的中国，提出中国受列强的人口压迫以警惕国人，也是由于政治的动机，与人口学者的理论不能一概而论，若从人口原理方面加以批评，其说不科学之点固多，例如他以近百年来各国人口增加率来推测将来的增加是很明显的不合理，但如此估计中山先生人口说的价值，不免流于苛求，更不是公正的态度”。^②

孙中山的人口思想还影响到当代中国人口的发展。无论我们曾认为人多是好事，忽视节制人口，还是后来又领悟到人口多带来的困难，从而决定控制人口，都多多少少地可以看到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在其中的影子。因此，对孙中山人口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的人口问题，了解人口思想的发展，且有助于追溯我国人口政策变化的历史渊源。而对孙中山人口思想的评价，我们只能基于“不流于苛求，又充分研究。”

值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撰写此文，谨表缅怀之情。

附注：

- ① 吴希庸《人口思想史》，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第265页。
- ②③④⑤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8页、635页、615页、601页。
- ⑥ 书同①第267页。 ⑦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卷第11页。
- ⑧⑨⑩⑪⑫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4页、810页、124页、648页、109页。
- ⑬ 《孙中山先生谈话》，上海《民主报》1912年6月26日。
- ⑭⑮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1页。
- ⑯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页。
- ⑰ 转引自张敏如《中国人口思想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73页。
- ⑱⑲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8—629页、第807页。
- ⑳㉑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4—845页、第855页。
- ㉒ 吴希庸《人口思想史》，第264—265页。
- ㉓ 参见胡显中《孙中山经济思想》中“孙中山人口思想”一章。
- ㉔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3页。 ㉕ 书同㉔第267页。

（作者工作单位：崔林，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研究生。

姚敏华，健康报社。）



国家统计局举办第二期生育力调查抽样技术研讨会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于1986年8月19日至9月15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了中国第二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抽样技术研讨会。中国第二期生育力调查是在1984年河北省、陕西省和上海市进行的第一期调查之后，继续对我国妇女生育状况进行的深入调查。这次调查将于1987年4月在辽宁、山东、广东、贵州、甘肃、北京五省市进行。参加兰州抽样技术研讨会的除上述五省一市的代表外，还有全国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会议邀请国际统计学会研究中心主任涅马博士和穆切阿特先生讲授了抽样调查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其他国家进行妇女生育率调查的经验。有关省、市的代表就如何分层、确定样本规模等技术性问题进行了讨论。代表们一致反映，通过这次研讨会，对抽样调查的理论和技术的提高。

（武超）